

##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人心”言说\*

秦 勤

**【摘 要】**“人心”既是传统文化中表达社会理想和重建社会秩序的核心意象，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因应时局的重要媒介。参与讨论人心问题的群体包括传统士绅、辛亥革命元勋以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其中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的“人心”言说并非因袭前人，而是根据时局做出调整，实现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更新再造。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以人心为改造社会的“大本大源”，而且将之与个体心性相联系，以磨砺出奋斗进取的精神风貌。在继承和重释传统文化资源的过程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革新与革命实践逐渐契合，由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治文化的基调和底色。

**【关键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人心 心性 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秦勤，历史学博士，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 (2026) 05-0125-16

“人心”作为传统文化中表达社会理想的重要意象，散见于历朝历代士大夫的治世方略中。例如，《孟子·滕文公下》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sup>①</sup>姚鼐《仪郑堂记》云：“自郑王异术，而

\* 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课题“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与统一战线的构建研究”(XSP25YBZ164)的阶段性成果。

① 方勇译注：《孟子》，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1页。

风俗人心之厚薄以分。”<sup>①</sup>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称言：“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一阴一阳，入于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sup>②</sup>可见，传统典籍中的“人心”言说主要指人的思想和心理，既指民众的普遍心态，也包含士人的个体心性，<sup>③</sup>其所涉内容虽颇为庞杂，但肯定了人心是衡量社会秩序的标准之一，并可以被改造为良善社会的基础。在西力东侵的大变局中，人心成为传统士绅裁量社会的准则。黄兴、宋教仁等辛亥革命元勋亦以苍生为念，将人心作为自身行止的规范。传统士绅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虽然关怀世道人心，却未能真正改造社会 and 实现其经世理想。在西学的影响下，梁漱溟引入心理学来重释儒学伦理，并于1926年开始撰写《人心与人生》一书。<sup>④</sup>梁漱溟在书中尝试从心理学角度解释儒家伦理观念，他认为：“所以倘你不能寻出孔子的心理学来，即不必讲什么孔子的伦理学。进而言之，要问孔子主张的道理站得住站不住，就须先看他心理学的见解站得住站不住。所以倘你不能先拿孔子的心理学来和现在的心理学相较量、相勘对，亦即不必说到发挥孔子道理。”<sup>⑤</sup>儒家伦理观念终究要落实到人类心理学层面，才能在巩固其立论基础的同时推陈出新，不致陷入无法自证的困境。

与此同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亦着眼于人心来探讨改造社会的方法。青年毛泽东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sup>⑥</sup>此中“天下之心”指社会启蒙中民众的普遍心态，毛泽东希望借助伦理学推进社会启蒙运动，这一观点得到蔡和森的赞

① 姚鼐：《仪郑堂记》，《惜抱轩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165页。

② 罗炳良译注：《文史通义·原道中》，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84页。

③ 朱熹即讨论了“人心”与“道心”的关联，认为“心”具有主宰性、意向性和知觉性，容易受外界影响而偏离本身的纯净虚灵状态，由此引出诚意正心修身等个体层面的修持问题。参见[美]成中英：《朱熹论“人心”与“道心”——从心的主体化与主宰性到道德心的实践》，《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67页。

④ 李渊庭、阎秉华编著：《梁漱溟年谱》，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68页。

⑤ 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⑥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同，他在给毛泽东的回信中称，“若天下治乱，其转移在于一心，人之贡献于人道，其功过不在形迹之上”。<sup>①</sup> 既然治乱兴衰皆根植于人类心理，那么革新社会就需要把握民众心态的变化。同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敏锐注意到民国政府对人心问题的关注，瞿秋白指出，蒋介石在镇压革命运动时推出“新政”的口号不过是欺骗民众的手段，“群众自觉的实行了革命的地方，国民党的枪炮和大刀的力量其实是微小得很，他们只能用一些狡猾和奸诈的手段来‘缓和人心’，期待着更好的机会，再进一步的实行完全恢复地主和豪绅资本家的十足的旧式剥削”。<sup>②</sup> 可见，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等重视民众心态在社会启蒙和革命中的作用，并将“人心”这一传统文化资源运用于革命斗争中。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心”言说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翻心”实践，考察现代革命实践与中国传统心术的内在延续性。<sup>③</sup> 本文拟梳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人心”言说，将“人心”置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中进行考察，并从生成背景、意涵演变与个体实践等角度加以讨论，以推进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治文化史研究。

## 一、晚清民初“人心”言说的递嬗

晚清民初，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日渐式微，几乎失去了规范人心的作用，人心之“恶”伴随着现实的沉沦而日趋明显。<sup>④</sup> 辛亥革命虽推翻

- 
- ① 蔡和森：《蔡林彬给毛泽东（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蔡和森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 ② 瞿秋白：《临死的呼号（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05~606页。
  - ③ 参见李放春：《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第5页。该作者还指出：“以激进的反传统面目出现的中国革命，其话语结构的深层却仍旧延承着传统的‘心学’义理。”（见李放春：《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第7~8页）也就是说，对“心”、“思想”或“精神的东西”的重视，是中国革命现代性实践的核心特征之一。
  - ④ 许纪霖认为：“晚清以来，物质文明在进步，但各种各样的现实与人心之恶也在借势发展。最重要之恶，乃是放弃了道德制约，任凭力在世道横行。”见许纪霖：《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第57页。

了封建帝制，但在改进民众实际生活方面成效有限，故将对时局的关切融入“人心”言说，成为传统士绅、辛亥革命元勋以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共通之处。

晚清时期，开明士绅郭嵩焘鉴于洋务运动暴露的问题，认为寻求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于振作人心，“中国人心偷敝已甚，其势万不能有济……人心流极败坏，以有今日，直无复可以有为之理”。<sup>①</sup> 洋务运动失败后，抵制变革的保守士绅又以收拾人心应对世变，“民族危机越是深重，中国在军事上越是一败涂地，正统士大夫越是有充分理由从这种‘人心浇漓’‘气节卑靡’的现象中坚定了‘砥励于实学’的国粹主义信念”。<sup>②</sup> 辛亥革命以前，深受儒学浸染的传统士绅不论是身处庙堂还是江湖，皆将人心视为挽救时局的媒介而加以阐发，却未能找到真正改造人心的途径，故振作人心仅止于精英阶层的救时舆论，难以真正融入改造社会的实践。民国初年，部分士绅仍然延续这一思路。刘大鹏在日记中记载山西局势中的人心离乱，“时局阽危，民不聊生，晋政苛虐，日甚一日，草野百姓，十室九空，而风俗奢华，人心不古，迁流日下，不知伊于胡底矣。民何不幸而生于斯时耶，予何不幸而目睹此时局耶”。<sup>③</sup> 刘大鹏中年和晚年饱尝时局动荡之苦，只得在日记中聊寄忧思，映衬出一种心忧天下却又无可奈何的士人心态。<sup>④</sup> 向来以清遗民自居的梁济因感于时局惨淡而希图用自杀振奋人心，他在遗书中坦言，“余故以清亡无人肯殉，非由人之尽解共和，实由人之尽存浇薄，断定为世道人心今不如古之确据”。<sup>⑤</sup> 梁济之死非为殉清，实因共和体制非但未能改善人心浇薄的局面，反而使之恶化，

① 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第11册，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242~243页。

② 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页。

③ 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5页。终其一生，刘大鹏保持着对社会的高度关切，始终以人心衡量社会的盛衰兴废。他认为：“当此之时，正在捣乱时代，大于一国、一省，小于一县、一村，此由于人心之不正，风俗之大坏，为政者失其政之故也。”见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9页。

④ 参见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页。

⑤ 梁济：《敬告世人书（甲寅五月稿未完戊午九月补成）》，梁济著，黄曙辉编校：《梁巨川遗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故他希望用死亡求得社会各界对人心的重视。<sup>①</sup>刘大鹏、梁济等将人心视为重焕社会生机的重要因素，也是士绅乞灵于传统文化资源的体现，多少显露出土绅面对变局的无奈之感。

辛亥革命前夕，黄兴认为群众心理已为革命大爆发准备了条件，“吾党之势力已普及于全军队（如北京、南京皆是），此次不过解散一部分，而其主要仍在也。今后人心更加奋发，一得机会，即再举动，可望成功”。<sup>②</sup>黄兴已洞察到人心中蕴藏的革命力量，并以屡败屡战的坚韧意志唤醒和引导这一力量，使之融入反清革命浪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顺应时代要求而推翻君主专制，足见人心向背在历史浪潮中的磅礴伟力。孙中山在回忆黄花岗起义时指出：“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sup>③</sup>黄花岗起义不只冲击了清政府的统治秩序，彰显了革命者的牺牲精神，更成为万千民心汇聚涌动的象征。革命党人中不乏以绝命来砥砺人心者，陈天华即如此，其牺牲精神固足以令人崇敬，之于革命前途却是严重损失，故宋教仁在《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跋》中直言：“夫以君之所志，使其所怀抱得毕展于世，无少残留，则吾民族受其福胙，其所造于中国前途者，岂有涯耶！”<sup>④</sup>更为重要的是，自杀也反映出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受时代局限与理论匮乏的影响，无法找到真正推进社会变革的道路，“（陈天华）出于爱国热忱，竟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唤起人们的觉醒，但也说明他缺乏更高的革命理论和更好的革命方法，看不到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伟大革命力量”。<sup>⑤</sup>作为思想资源的“人心”在传统士绅和革命党人之间流动，被用于表达对时局的省思。相比之下，传统士绅的“人心”言说颇为空洞，而革命党人则通

① 参见罗志田：《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梁济之死》，《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第1页。

② 黄兴：《致宫崎寅藏书（1910年4月28日）》，刘泱泱编：《黄兴集》第1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③ 孙中山：《〈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页。

④ 宋教仁：《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跋（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1页。

⑤ 王鉴清：《陈天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

过将“人心”言说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联系，展现出人心与社会现实的关联。

辛亥革命虽实现了政治鼎革，但未能改善世道人心。李大钊指出：“政俗不良，人心[怀]厌倦之思。世之衰也，忠贤放逐，归隐林泉，其极乃至厌倦人世，饮恨自裁。”<sup>①</sup>李大钊将蒋百里自杀之举归因于政俗不良，以致人心禁抑，丧失奋斗希望。黄远生乃民国新闻界翘楚，他注意到时局下的人心倦怠问题，“全国之人，厌倦舆论、厌倦议会、厌倦政府、厌倦一切政谈，其结果将厌倦共和、厌倦国家。呜呼！以此现象，吾恐今日人心所对于国家之观念，其危险殆非常智所能鉴悉者”。<sup>②</sup>在黄远生看来，外交、财政、议会、政党等皆属枝节问题，<sup>③</sup>而振奋人心实为追求国家复兴的关键。早年曾亲历辛亥革命运动的鲁迅，在目睹国民性的积弊之后，则试图以文学的力量求得人心振作，“怎样理解‘人心’，历来是中国文人思想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视‘人心’为评判社会的第一指标，也是中国思想的一大特征。鲁迅自然不例外，他对社会和自己的看法，有许多都是从对‘国民性’的认识中生发出来的”。<sup>④</sup>在民国初年的社会舆论中，“人心”言说仍然是重要内容，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现实的促动下，也自觉加入这一讨论，为传统文化资源注入新的思想内涵。

综上，晚清士绅延续了儒学重视人心的传统，他们慨叹人心不古又无法找到改造人心的路径。辛亥革命元勋通过不断起义振作民众麻木的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民众的革命意识，但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究无法挽救国家命运。此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借助传统文化中的人心资源表达自身的政治主张，进而逐渐探索出一条社会革新的现实路径。

## 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人心”言说的生成

作为传统文化资源的“人心”，经由传统士绅、辛亥革命元勋的阐发，流传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间。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口

① 李大钊：《原杀（暗杀与自杀）（一九一三年九月一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页。

② 黄远庸：《论人心之枯窘》，《远生遗著》，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75页。

③ 参见黄远庸：《论人心之枯窘》，《远生遗著》，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75页。

④ 王小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88页。

号的影响下，各种文化资源被重新审视和阐发，展现出思想领域的丰富多歧。<sup>①</sup>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人心做出多样解读，试图应对民族危难下的文化挑战。

艰难国运和沉郁时局压迫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脑，刺激着他们思索改造社会的新途径。魏野畴是西北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他深刻体会到当时陕西局势的黑暗恶浊：“想想包围我们的环境，本省的情境，全国的情境，世界的情境；我们觉得烟雾重重，遮住我们的视线；看不见什么，只有黑暗；触不着什么，只有威权。”<sup>②</sup> 瞿秋白以动人笔触描绘其社会感知：“阴沉沉，黑魇魇，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所在，我有生以来，没见一点半点阳光，——我直到如今还不知道阳光是什么样的东西，——我在这样的地方，视觉本能几乎消失了；那里虽有香甜的食物，轻软的被褥，也只值得昏昏酣睡，醒来黑地里摸索着吃喝罢了。”<sup>③</sup> 在瞿秋白看来，现实社会的“腥秽污湿”让人无法感受到丝缕光明与温暖，逼迫他不得不逃离“黑甜乡”，<sup>④</sup> 去“饿乡”寻找希望。自趋绝地反映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冲破现实藩篱的决心，也足见其内心涌动着追求光明的真挚情感。瞿秋白好友郑振铎也强调：“理性是难能使革命之火复燃的。因为革命天然是感情的事；一方面是为要求光明的热望所鼓动，一方面是为厌恶憎恨旧来的黑暗的感情所驱使。因为痛恨人间的传袭的束缚，所以起了要求自由的呼声；因为看了被压迫的辗转哀鸣，所以动了人道的感情。大部分的社会主义者都是感情极强盛的人，都是看不惯旧的齷齪，所以希冀新的光明的。”<sup>⑤</sup> 瞿秋白、郑振铎等背黑暗而向光明的热忱心理是 20 世纪 20 年代社会心态的反映，正如张灏所言：“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以历史潮流代替天意，同时保留了传统对心的信念，其

① 参见周月峰：《折中的“重估”——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提出看五四新文化的多重性》，《近代史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85~86 页。

② 魏野畴：《告陕西青年（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编：《魏野畴：传略·回忆·遗文》，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70 页。

③ 瞿秋白：《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 页。

④ 瞿秋白：《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 页。

⑤ 郑振铎：《文学与革命》，《郑振铎全集》第 3 卷，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20 页。

结果是一种近乎主观意识决定论的观念。我们可称之为意识本位的历史发展论。”<sup>①</sup>

在李大钊看来,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运动均未能真正改造社会,其原因在于未能触及社会普遍心态,“今吾国历更革命已经三度,而于忏悔之义犹未尽喻。似此造劫之人心,尚未知何日始能脱幽暗而向光明。瞻念前途,浩劫未已,廉耻扫地,滋可痛矣!”<sup>②</sup>李大钊将砥砺人心视为脱却黑暗奔赴光明的重要路径,并将剖析和改良“造劫之人心”作为社会改造的方法。迥异于清朝遗老遗少对“人心浇漓”的感慨,李大钊则立足社会进化论,认为时代变革和人心更易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表征,旨在打破崇古慕古的旧式人心观,转而将人心楔入社会改造中。他主张本诸人心而化成风俗,“离于人心则无风俗,离于风俗则无群。人心向道义,则风俗日跻于纯,人心向势力,则风俗日趋于敝。声之所播,力之所被,足以披靡一世之人心”。<sup>③</sup>此中“风俗”的含义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生活习俗,而指将个体思想汇聚成可资时局改造的集体意志,“人心有来复之几,世运即有回转之势,虽有权谋,莫能抗也。势力既基于人心,人心能卓自树立,则乡[向]之所谓势力者,斯弗能表示群众之意志,则将驯伏于人心之下,勿敢自恣”。<sup>④</sup>李大钊认为,只有保持精神独立,才能形成真正的集体意志,而不为政客军阀役使。陈独秀也从人心角度论述社会改造的路径:“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晰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sup>⑤</sup>陈独秀改易“心血”之意在于以人心为基点,推动人格、国家、社会、家庭、民族等方面的更新再造。李大钊、陈独秀重视人心,并以之为社会变革的切入点,经由李、陈二人的引介,“人心”言说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得到广泛认可,其中毛泽东、蔡和

①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页。

② 李大钊:《罪恶与忏悔(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页。

③ 李大钊:《风俗(一九一四年八月十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页。

④ 李大钊:《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

⑤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五日)》,《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页。

森的相关阐发尤为具有代表性。

杨昌济颇为器重毛、蔡二人并向章士钊引荐，称“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sup>①</sup>毛、蔡二人对人心的关注离不开其师杨昌济的影响。1919年，杨昌济在《告学生》一文中讨论青年学生与政治的关联，他在结尾处强调“转移风气，在乎一二人之心而已”。<sup>②</sup>杨昌济是近代湖湘文化传播的关键人物，其思想观念受曾国藩的影响较深；而作为湖湘文化巨擘，曾国藩对人心的思考更是湖湘文化知识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了湖湘大地上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知识青年。曾国藩强调人心乃风俗之源：“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随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随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sup>③</sup>曾国藩认为英雄人物能够引领时势，并在改易风俗人心方面起到关键作用。曾国藩、杨昌济的观点颇为相似，也都融入了青年毛泽东的救世观念。青年毛泽东曾服膺于曾国藩的治国理政方略，“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sup>④</sup>故于改造社会和重建秩序而言，毛泽东亦将砥砺人心作为因应时局的重要凭借，“他之所以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话，是因为曾国藩懂得并运用‘本源’”。<sup>⑤</sup>1917年8月，毛泽东与黎锦熙纵论时局，他认为改变“民智污塞，开通为难”<sup>⑥</sup>的现状应从本源入手：“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

- 
- ① 章士钊：《杨怀中别传》，王兴国编：《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89页。
- ② 杨昌济：《告学生》，王兴国编：《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67页。
- ③ 曾国藩著，王澧华点校：《曾国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页。
- ④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 ⑤ 李吉、张胜祖：《怎样理解毛泽东早年和晚年评价曾国藩的两句话》，李佑新主编：《毛泽东研究·2011年卷》，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页。
- ⑥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sup>①</sup>在汲取湖湘前贤思想精髓的基础上，毛泽东将人心视为社会改造的根本所系：“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sup>②</sup>

人心既为改造社会的“大本大源”，那么如何引动人心就具有决定性意义。毛泽东主张从伦理学着手，“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sup>③</sup>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将改良人心纳入新民学会的宗旨，即“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sup>④</sup>虽然这一思想不免带有唯心史观色彩和个人英雄主义特质，但是“包含着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和崇高目标，如果加以科学改造和提升，就能够发挥出强大的精神引领力量和实践创造力量”。<sup>⑤</sup>青年毛泽东在探寻社会改造的本源时以人心为切入点，对其后来的革命实践有着重要影响，“他后来那样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必须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和思想意识，或发端于此”。<sup>⑥</sup>

人心是个体心灵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李大钊、陈独秀等基于对社会黑暗的共同感受，从宏观层面肯定人心在整肃社会风俗和复兴国家民族中的作用。毛泽东、蔡和森的“人心”言说既以曾国藩的言论为远源，又深受

①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②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86页。

③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⑤ 金民卿：《从“圣贤救世”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推进“第二个结合”的一个生动体现》，《伦理学研究》2023年第6期，第3页。

⑥ 陈晋：《毛泽东阅读史》，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7页。

杨昌济、梁启超等推崇的改良主义的影响，进而认定人心是社会改良的着力点。

### 三、“人心”言说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心性改造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立足人心以省思时势的同时，还致力于个体心性的改造。李大钊曾提出“心力”说，主张以“心力”淘洗自我，再由自我通达大众以推动社会改造事业，“李大钊个人的心路历程也使他相信，短促的人生包含着罪孽和黑暗，需要个体依靠强大的‘心力’去淘洗与自我净化，从而使‘小我’在宇宙、人类等更高的意义层面——‘大我’中获得价值的超越”。<sup>①</sup>“心力”说旨在通过自我淘洗改造个体思想意识，以适应社会变革的实际需求。

社会现实刺激着个体的情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已认识到心灵与现实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赤都心史》的序言中，瞿秋白剖陈心灵与外在世界的联系：“人生的经过，受环境万千现象变化的反映，于心灵的明镜上显种种光影，错综闪烁，光怪陆离，于心灵的圣钟里动种种音响，铿锵递转，激扬沉抑。”<sup>②</sup>人心隐约地映照出外部环境的种种光影，故人心为社会现实桎梏，青年人在种种束缚之下而深感悲观绝望，“中国社会到了今日，黑暗算是达于极点。中国若有有血气、有理想、有精神的青年，对于这种黑暗的社会，没有趣味的生活，当然不满意、失望、悲观”。<sup>③</sup>周恩来早年也意识到人心与社会改造的重要关联，他认为重塑中国社会的根本在于挽救人心：“中国维新亦已十余载，政体已更，欧美之法非不行于中国，而国之弱也贫也如昔。其所以贫弱之原因，则由于人心堕落，民德沦丧，故欲救中国之不亡，必自正人心始。”<sup>④</sup>

① 段炼：《寻求超越：五四时期李大钊的个人价值认同》，许纪霖主编：《多维视野中的个人、国家与天下认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页。

② 瞿秋白：《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

③ 李大钊：《青年厌世自杀问题（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9页。

④ 周恩来：《子與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衷言之欤（一九一五年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周恩来早期文集（一九一二年十月——一九二四年六月）》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较早摆脱了颓废退隐心态。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新青年应具有进取的人生观，抛弃消极退隐思想：“当此恶流奔进之时，得一二自好之士，洁身引退，岂非希世懿德；然欲以化民成俗，请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sup>①</sup> 他反对传统社会中归隐林泉的行为，主张以竞争精神改造“恶社会”，实现化民成俗的目标。在决然于努力进取以改造社会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尤其重视青年心性问题。魏野畴主张挽救青年道德，抵制社会的积弊恶浊，“我们不能投降恶势力，不能与世浮沉，因为这是一条不合理的倒走的途径”。<sup>②</sup> 恽代英强调通过个人奋斗形成足以消解“恶势力”的“善势力”，进而建设良善社会，“善势力苟能稍强恶势力，则此随风偃仰之大部分人，今日之降服恶势力者，必须即刻改头换面，而降服于善势力。如此则恶势力之羽翼亡，而实力薄弱矣”。<sup>③</sup> 在面对“恶社会”与“恶势力”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反对苟安退隐的人生观，并以实际行动开拓个体和社会的新生路。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崇尚奋斗进取的精神，而且在社会改造事业中深入开展自觉和觉他的实践。青年瞿秋白借访问新生的俄国苏维埃政权之机，探索社会改造的途径：“我要求改变环境：去发展个性，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sup>④</sup> 瞿秋白以自趋绝地来求取社会的新生路，决然放弃了传统社会中的隐逸思想，“我呆呆的坐着思前想后，也很乏味，随手翻开一本陶渊明的诗集，看了几页又放下了。觉着无聊，站起来凭窗闲望”。<sup>⑤</sup> 陶渊明是传统社会中典型的主动逃离尘世喧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2~93页。

② 魏野畴：《告陕西青年（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编：《魏野畴：传略·回忆·遗文》，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页。

③ 恽代英：《一国善势力之养成（一九一八年十月）》，《恽代英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8页。

④ 瞿秋白：《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⑤ 瞿秋白：《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器的隐逸隽洁人士，但面对近代中国的严峻形势，瞿秋白不再借陶渊明的文章安抚内心，达到超然物外的目的，而是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对社会救亡路径的探索。在与毛泽东的通信中，蔡和森认为“此事（引按：留法勤工俭学）全在人做，初无可靠与着落之可言，必欲穷其可靠与着落，则莫如吾辈之自身”。<sup>①</sup> 蔡和森主张以行动为先，不可因瞻前顾后而丧失进取心。青年毛泽东则以济世救民的使命自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sup>②</sup> 虽然所谓“君子”“小人”不免带有传统文化的阶层色彩，但这无疑是青年毛泽东勇担挽救社会使命的体现。先觉者应为了民族和大众的利益不惮于前驱，正如施存统<sup>③</sup>所言：“我们真要干社会革命，应该有少数人（但也不是几千几百人）就干，决不能等多数人都觉悟了然后才动手。”<sup>④</sup> 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等均主张投身改造社会的运动，在直面黑暗现实的同时，拯救民众于水火。

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看来，改造个体心性实为改造社会的前提。蔡和森在与毛泽东通信时强调，要不惜牺牲个人的名誉来打破黑暗，肩负改造社会使命的知识分子不应为舆论、道德等声名束缚，应具备“与恶为伍”的觉悟和勇气，“弟内有恢恢之志，外殊不尚兢兢之行；自信其心既正，将

- 
- ① 蔡和森：《蔡林彬给陈绍休萧子暉萧子昇毛泽东（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页。
- ②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
- ③ 施存统（1899—1970年），早年求学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因发表反封建名篇《非孝》而声名远播；1920年，参与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赴日留学并组建旅日党组织；1922年回国后，受陈独秀委派，主持重建青年团，并当选团中央第一任书记，任机关刊物《先驱》主编；大革命期间，任上海大学、中山大学教授，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教官；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中国共产党；1945年，与黄炎培等共同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劳动部副部长等职。
- ④ 施存统：《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1页。

来有恶当前，必不少避而勇为之；恶经正人君子为了一回，则其阶级，就要演进一层”。<sup>①</sup> 为了廓清社会中弥漫的伪善风气，共产党人应不计个人毁誉，毅然投身社会改造，“若天下治乱，其转移在于一心，人之贡献于人道，其功过不在形迹之上。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sup>②</sup> 蔡和森坦言其愿望即牺牲小我而成就大我，“与恶为伍”的目的是战胜社会的“恶”，保障民众的根本利益；而“以万恶为肥料”<sup>③</sup> 的主张，则体现出他包容万物的宏大胸怀与让万世蒙利的宽阔眼界。

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肯定个体心性的关键作用，并强调在成长过程中对其加以磨砺，摆脱退隐苟安心态，树立进取精神。这种精神甚至包含着自我牺牲，正如蔡和森所言，要“与恶战”“与恶和”，制服“恶社会”而建设良善社会。<sup>④</sup>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强调自我磨砺，其进取与牺牲并举的精神堪称深化近代革命运动的思想指引，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思想文化演进脉络中具有重要地位。

#### 四、结语

观照人心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试图系统解决社会问题的反映，他们敏锐洞察社会弊病，视人心为革新社会的着力点。传统士绅、辛亥革命元勋等虽不乏有关人心的阐发，但未能将人心与社会现实密切相联，也就难以找到真正改变社会的伟大力量。在古今中西文化交融会通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借用人心的表达革新社会的主张，他们将人心与个体心性相联系，从而通过改造主观世界为改造客观世界奠定基础。

- 
- ① 蔡和森：《蔡林彬给毛泽东（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蔡和森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 ② 蔡和森：《蔡林彬给毛泽东（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蔡和森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 ③ 蔡和森：《蔡林彬给陈绍休萧子暲萧子昇毛泽东（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页。
  - ④ 参见蔡和森：《蔡林彬给毛泽东（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蔡和森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人心”不仅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自我改造的思想资源，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实践的组成部分。国民大革命时期，中共地方组织在与中共中央的通信中仍在讨论人心问题，主张将革命启蒙、思想教育和民众动员有机结合，“政学系人物……因利乘便大肆挑拨，谓此事纯系一、二人包办，且谓共产党为专门捣乱之党，分裂学生队伍，学生受其愚者数殊不少。本地委现虽令各同志向同学解释长期斗争之意义，宣布教职员离间学生之阴谋，然挽回人心，究非易事也”。<sup>①</sup>在争取学生的过程中，国民党右派言论妨碍了青年人向革命队伍靠拢，“悼孙会上虽做了点事，总没得到实力，如人心未归，但这稍与市民校之反动有关”。<sup>②</sup>国民党高层对人心问题虽有所关注，但重视不足，故缺少砥砺青年革命思想的动力，致使青年徘徊于革命队伍之外。到了20世纪30年代，国共双方的斗争不仅体现在激烈的军事冲突上，还体现在谁能满足民众的革命期待方面。瞿秋白认为民众心向共产党，对苏维埃革命是同情和支持的，“然而‘人心’还是不安的‘人心’，是同情于苏维埃革命的，那些现在还‘缺乏社会意识’的民众正在一天天的取得这种意识。国民党的一切‘改革’的空谈，也和他们的轰炸政策一样，始终是没有效用的”。<sup>③</sup>国共双方斗争的根本在于谁能赢得人心，故激发民众的革命意识至关重要，它关乎苏维埃政权的存续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长远发展。

随着时代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唯物史观不断改造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使他们不再局限于个体心性的改造，而是聚焦于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以求得社会的整体进步。施存统直言：“所以凡是有志改造社会一般制度的人，都当然要向改造经济组织这一个目标去努力。如果不向这个目标去努力，妄想借改造人心来改造社会，包管改造一万年也没有效

① 《团衡阳地委十月至十一月工作报告——团的组织与各团体组织状况，内部训练与对外宣传，学生与青工运动，地委组织及国民党情况等（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84年内部刊印版，第349页。

② 《团九江特支报告（第五号）——关于二、三月宣传、学生工作（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86年内部刊印版，第164页。

③ 瞿秋白：《临死的呼号（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06页。

果。”<sup>①</sup> 施存统意在说明单纯以改造人心为基础的社会启蒙无法解决现实矛盾。因此，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政治与经济问题入手，探求社会改造的根本路径，“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概括说一句，就是全社会的经济组织不从根本改革，其余的改革都是无效的”。<sup>②</sup> 在围绕人心的讨论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调整话语指向，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态度从借用到重释，再到融入革命实践，反映出传统文化资源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紧密关联。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扎根其中的部分思想观念也因失去存在的土壤而动摇瓦解，“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sup>③</sup>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继承了传统文化资源，而且在推陈出新方面走得更远，其认识广度和实践深度都远远超越同时代的其他群体，最终蹚出一条社会改造和民族解放的崭新道路。

总之，“人心”言说的迁转递嬗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潮流的变动有关，反映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改造中国社会的宏观视野。因此，开展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发展理路的多角度研究，既有助于勾勒中国共产党早期思想文化的复杂图景，对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发展历程也有着重要镜鉴意义。

（责任编辑：张梦晗）

- 
- ① 施存统：《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1页。
- ② 施存统：《“工读互助团”的经验和教训（节录）（一九二〇年四月十日）》，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页。
- ③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1页。